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作风建设这个『木鱼』要天天敲

□ 庄德水

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中指出，作风建设要抓常、抓细、抓长，这个“木鱼”要天天敲，让全党始终保持高度警觉。

唐代高僧怀海禅师所撰的《敕修百丈清规》记载：“相传云，鱼昼夜常醒，刻木像形击之，所以警昏惰也。”鱼昼夜不眠，取其精神，刻木为鱼，可以用来警示佛门弟子时刻保持警醒，修习佛法要像鱼一直睁着眼睛那样，不可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习近平总书记用“木鱼”比喻作风建设，充分彰显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深刻揭示了党的作风建设不是一时一事之功，只有锲而不舍、常抓不懈，才能使改进作风在全党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

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形成优良作风不可能一劳永逸，克服不良作风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稍有松懈，就可能死灰复燃。从现实情况来看，不良风气往往与社会传统观念、旧有习惯和利益格局相互交织，一些作风问题仍有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个别党员干部对作风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麻痹思想和松懈情绪，认为作风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可以松口气、歇歇脚。个别党员干部产生“疲劳综合征”，对作风问题的隐形变异、潜滋暗长的新表现新动向缺乏敏锐性警惕性。个别地方和部门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时，存在打折扣、搞变通的现象，对隐形“四风”问题的发现和查处力度不够，使得违规者心存侥幸。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这也说明，天天敲“木鱼”作为一个警示，对作风建设具有极端重要性。

天天敲“木鱼”并非易事，需要坚强的毅力。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抓好作风建设非一日之功，需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一个毛病一个毛病纠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突破，一年接着一年坚守。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作风建设将陷入“抓一抓就好一些，放一放就松下来”的怪圈。天天敲“木鱼”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充满着使命感和责任感，容不得任何懈怠和轻视。着眼于“抓常”目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明确作风建设的政治责任，把作风建设作为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坚持领导带头做、带头抓，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传导压力、层层抓落实，形成以上率下、以上带下的良好氛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增强定力、养成习惯，推动作风建设从“点上突破”向“面上开花”拓展，让清风正气充盈干事创业的每个角落。

敲“木鱼”有真敲和假敲、重敲和轻敲、长敲和短敲的区别。同理，作风建设的实践充分说明，抓和不抓大不一样，真抓和假抓大不一样，严抓和松抓也大不一样。着眼于“抓细”目标，既旗帜鲜明地敲响“木鱼”，唱响作风主旋律，传递作风新要求，让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又恰到好处地敲准“木鱼”，保持合理的工作力度和节奏，精准切中党员干部作风问题的要害和穴位，真正把作风问题找出来，深挖细查，触及灵魂，点到痛处，标本兼治地解决作风问题。

天天敲“木鱼”重在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提高党员干部坚持优良作风、抵制不良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眼于“抓长”目标，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在“木鱼”的警示下，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把他律要求转化成内在自律追求，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同时，瞄向“木鱼”天天敲的常态长效，健全和执行作风建设机制，从制度上堵塞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以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巩固作风建设成果。

以自我革命精神过好“五关”

——重温周恩来《过好“五关”》

□ 纪亚光

重读经典

《过好“五关”》是周恩来于1963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的一部分，收录在《周恩来选集》下卷。这篇文章生动阐释了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为克服当时党政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想、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明了方向。重温这篇经典文献，对于深入理解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优良作风凝聚党心民心、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领导干部“要一步一步地过好‘五关’”

“五关”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周恩来谈“五关”问题，集中于世情、国情深刻变化的1963年至1964年。当时的中国，处于“在新的发展中新的困难”的关键时刻。一方面，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总体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四个现代化”的蓝图日渐清晰明确。但与此同时，中苏关系、中印关系复杂微妙，国际形势云谲波诡。为战胜困难、抓住机遇、开创新局，周恩来站在“最困难的时候对革命来说，恰恰是走向新胜利的转折点”的历史高度，面向社会各界、领导干部、自己的亲属明确提出了过好“五关”问题。

1963年1月28日，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各界民主人士春节座谈会上首次提出“要过好思想、政治、生活、家族和社会五个关”；随后，在首都文化艺术工作者元宵节联欢会上再次要求大家必须过“五关”，“学到老，改造到老，对自己的思想言谈要经常反省”。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针对当时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谎话的现象，严厉批评了官僚主义，要求领导干部严格要求自己，一步一步地过好“五关”。过“思想关”就是领导干部

必须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过“政治关”，就是党员干部要坚定政治立场，始终保持同党中央高度一致，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过“社会关”，就是在现实世界的多重考验中坚守党性原则，改进工作作风、锤炼实际本领。过“亲属关”，就是党员干部要正确处理公私关系，严于律己、严于治家，在社会的熔炉中锤炼子女。过“生活关”，在物质生活方面，就是知足常乐，使艰苦朴素成为美德；在精神生活方面，就是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

“五关”是互相贯通的整体，其中，过好“思想关”“政治关”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过好“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是保持党的优良作风容易被忽视的关键。周恩来将“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与“思想关”“政治关”联系在一起进行系统论述，体现了我们党对作风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深刻认识。

思想改造没有止境、政治立场的考验随时存在

以不断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筑牢党的作风建设根基，是我们党保持优良作风的成功经验。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周恩来将过好“思想关”“政治关”作为加强党的优良作风的出发点，予以高度重视。

周恩来站在思想改造没有止境、政治立场的考验随时存在的高度，阐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必须克服思想政治上的惰性与偏见的重要性。他指出，时代是不断前进的，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一万年以后，在人们的头脑里，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新和旧的矛盾，个人和集体的矛盾，还会有思想改造的问题”。同时，社会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随着环境的调整“注意自己的思想”。他强调，“即使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

如果忽视了改造，革命意志衰退了，还是要落伍的”。

对于如何筑牢作风建设的思想政治根基，周恩来指出：一是要“学会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和最近讲的认识论”，通过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高理论修养，并将其运用到实践之中。二是要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始终注意坚持思想改造，经常“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从工作态度、政策水平、群众关系中考察党性修养水平，从“是不是知过能改”中考察政治素养。三是要端正态度，把“思想改造看成象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以开阔的胸襟“一直改造到老”，以坚定的党性和高尚的政治操守经受各种诱惑与考验，站稳政治立场。

严于律己不断加强作风建设

从社会生活的小问题入手解决党的作风建设大问题，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途径。基于自身的成长经历和长期艰苦卓越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过好“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的艰巨性。

周恩来强调，“一般总是讲思想、政治两关，我特别提出后三关，是因为中国这个社会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社会的任务”。首先，我们党以改造旧社会、建设新国家为己任，领导干部必须要投身社会实践之中去改造社会，但是“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于各个角落里”，如果失去警惕，很容易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其次，面对“天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亲属，能否严守公私的边界，正确处理与亲属的关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最后，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人的生活要丰富一点，精神更要舒畅一点”，但是领导干部肩负着以党风政风引领社会风气的重任，在日常生活中能否保持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必须严于律己。他以自己为例，“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

对于如何过好“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周恩来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一是要思想过硬、立场坚定。对社会，在于“是你影响它，还是它影响你”；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是领导干部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我们党并非简单地要求领导干部“一天到晚只搞政治斗争，只干工作”，而是要保持艰苦奋斗的共产党人本色，牢固树立人民立场，坚定践行使命担当。他深刻指出，“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二是投身到社会之中，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在改造社会中实现共产党人的自我改造，这样“就有了力量”。周恩来指出：“解决亲属问题的最好办法主要是依靠社会，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对于如何依靠社会，周恩来在教导自己的晚辈时给出了答案，即“要创造环境，多与新的生产者接近、来往，自己也要多劳动”。他特别强调，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作出一点表率来，对子女应“要求高、责备严”，以此“督促他们进步”，“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三是“要有长期奋斗的决心”，“你改造了它，它又影响了你，互相改造，这是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

周恩来敏锐地从领导干部生活中的“小事情”看到了作风建设的“大问题”，从过好“思想关”“政治关”到过好“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体现了对党员领导干部以上率下改进生活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为全党全社会作出垂范的要求。重温周恩来过好“五关”的论述，体会贯穿其中的自我革命精神，从严格要求自己做起，将理想信念、党性修养、优良作风扎实贯彻在生活中、家庭里、社会上，在今天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上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是一个非凡动人的故事”

——读〔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 何虎生

从外国人著作看中国

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曾获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长期关注中国改革，在其与中国学者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中，科斯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深刻思考，向世界读者展现了中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道路，指出“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是一个非凡动人的故事”。

“一次新的长征”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就迅速且平稳地完成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出乎了国内外许多观察者的预料。科斯在书中试图“详细追述带来这一结果的一系列事件和其中的来龙去脉”，探寻中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内在逻辑与运行机理。他指出，“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最非凡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在市场经济转型道路上不仅没有被削弱，反

而发展得更加强大。社会主义信仰和市场经济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是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拥有脚踏实地的态度和务实的心态，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都没想到放弃社会主义”。他还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宣告的目标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对于中国来说是第二次革命和一次新的长征。

科斯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基本上白手起家”，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不是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的“大逆转”，而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历史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具有延续性的革新。科斯进一步指出，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相比，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没有采用“大爆炸”改革策略同过去的制度“一刀两断”，而

是采取了渐进式的温和做法，在合理评估其他制度优劣基础上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科斯认为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改革风格，才造就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故事”

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的叙述中，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来自两种改革的合力推动。其中一种是政府主动推动和引导的改革，比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迅速开始的对农业的调整和对国营企业经营的改革措施等。而另一种是人民出于自发性而主动探索的改革尝试，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等。科斯给予了第二种改革很高的评价，指出这种民间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起到了改革先锋的作用，

将市场力量和竞争动能引入到中国经济社会中，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因素和新的活力。科斯认为，如果无法正确认识中国改革中的这两种力量，我们就很难理解“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故事”。

这是一个怎样的“最伟大的故事”？科斯写道：“中国经济改革的故事是坚强的民营企业家的故事，是勇敢的零星社会实验的故事，也是谦逊又刚毅的中国人民为了美好生活奋斗的故事。”正是广大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才造就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中国无与伦比的制度创新能力，保证了中国经济的健康与繁荣。

科斯通过分析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图景：上层的政治建筑实行鼓励创新的宽松性政策，支持各主体进行尝试，一边在实践中验证改革方法的可行性，一边为更大

规模的改革实践提供新鲜经验。将自下而上的经验与自上而下的设计结合起来，是科斯提出的改革开放成功的“公式”。此外，他还关注到更大区域内中国地方竞争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指出了区域间的经济竞争“让试错学习的时间大大缩短，优秀的经济发展方式得以迅速扩散”。

“只有宽容和开放的文明才能持续地发展”

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与思想、制度、法律的良性互动。在改革开放走向深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张力问题。科斯回溯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中的认识探索和理论创新，他提到，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解放为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奠定了良好的认识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解除了党员群众心中的疑虑与枷锁。针对西方学者往往将苏联与社会主义中国简单类比的思维，科斯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在意识形态与组织形式上都和苏联有着明显不同，“显然不是第二个苏联”。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分顺理成章的时代创造。

值得一提的是，科斯在书中还特别阐释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与当代改革开放的内在关联。他指出，“不管给中国贴上什么样的标签，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历史遗产的重要性，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快速经济转型和将来的发展前景”。一方面，中华民族对于市场经济并不陌生，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生机勃勃的商业和市场经济体系，科斯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商业繁荣为现代改革开放的成功推进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另一方面，他高度评价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文明特质，指出“现在的西方社会也不是世界的掌控者”，人类的历史证明，“只有宽容和开放的文明才能持续地发展，享有不可限量的未来”。在这些所有优势条件和历史沉淀的支撑下，科斯预言，“一个开放、宽容、自信和创新的中国将会在不久的将来给世界带来更大的惊奇”。